



# 卫聚贤与中国考古学

◆ 刘 斌 (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)  
◆ 张 婷 (西安碑林博物馆)

1921年~1949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和初步发展期。短短的二十多年里,虽然期间还经历了8年抗战和4年内战,但是考古学却从无到有,取得了长足的发展。笔者以为,推动这一时期考古学发展的,就国内而言,有一主一辅两支力量。主力军广为人知,是以李济、梁思永、裴文中等为主的学院派,他们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,供职于专门或与之相关的研究机构(主要是中研院史语所,也包括地质调查所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等),无论发掘还是研究,都可谓成绩斐然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支辅助力量,就是热心考古事业的一些非专业人士。他们虽然不专门从事考古事业,但是在考古学草创时期,同样对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他们在考古学史上的贡献,近年已渐渐引起了人们关注,而卫聚贤,就是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。

卫聚贤,1899年3月11日出生于甘肃庆阳西峰镇。3岁时父亲去世,在家庭陷入绝境后,母亲改嫁到山西省万泉县(今万荣县)。因为家境寒苦,卫聚贤求学的过程一波三折,充满了艰辛,其间曾在商店当过学徒,也在小学当过老师。他在山西省立商业专门学校上学时,就对历史产生了深深的兴趣。1925年从商专毕业后来到北京求学,次年8月,27岁的卫聚贤考入了当时水平一流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。清华国学研究院仅开办了四年(1925~1929年),卫聚贤考取的是第二届,比他高一级的有徐仲舒,一同考入的有王力、吴金鼎等人。研究院当时有梁启超、陈寅恪、王国维、赵元任等四大导师以及特约讲师李济。卫聚贤专修的是中国上古史,毕业论文做的是《春秋研究》,主要由王国维指导,但是他也受到李济很大的影响。李济仅比卫聚贤年长3岁,当时以特约讲师的身份任研究生导师,指导的学生仅吴

金鼎一人。当时国学院的课程分为“讲课”和“专题研究”两类,李济为全院(和本科历史系)讲授考古学、人种学(民族学)等课程,因为课程充满了图版、图表,枯燥乏味,很多学生并不喜欢,不过李济对卫聚贤后来的兴趣和治学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卫聚贤考入国学研究院那年(1926年)的10月~12月,李济发掘了山西西阴村遗址,这是由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。这时国学研究院刚刚成立了考古学陈列室,李济发掘完毕,把石器、陶片等遗物运回清华学院整理和展览。卫聚贤看了西阴村出土的陶片后,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常看见过。1927年春他因事回家乡万泉,才知道家乡就有这样的石器时代遗址,这也是后来他在家乡万泉发掘的原因。

卫聚贤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了两年后,于1927年6月毕业。毕业后他先是与友人在山西太原合办私立兴贤大学,之后因人介绍,赴南京任大学院科员,主要是审查历史教科书,同时还兼任1917年成立的南京古物保管所所长。在任期间,卫聚贤主持了两次考古发掘。第一次是1929年9月发掘明故宫,这也是他首次进行考古发掘。当时南京的饮水大多是取自池塘,1929年恰逢大旱,水位降低后,村民在南京明故宫外五龙桥东南侯家塘挖出砖和木板,于是卫聚贤前往发掘。遗址属于明代工部后面燕省湖中的楼阁,发掘出土了铜、瓷等遗物和一些建筑构件。另一次发掘是在1930年3月。当时南京栖霞山上的六朝造像和隋代佛塔被游人损毁严重,教育部于是派卫聚贤前往调查。他在途经甘夏镇时发现了六朝时期的砖块,于是1930年3月,他选择了栖霞山车站西北甘夏镇、张家库、刘家库等三处地点发掘,其中甘夏镇、张家库两处的坟墓发掘前都已经塌陷了。这次发掘还是以南京古物保管所的名义,除了



图一 山西万泉后土祠遗址发掘的工作人员  
(最右边者为卫聚贤先生)



图三 山西万泉后土祠遗址发掘工作人员正在  
吃午餐(最右边者为卫聚贤先生)



图二 山西万泉后土祠遗址发掘场景



图四 山西万泉后土祠遗址发掘的  
工作人员及工人合影



图五 山西万泉后土祠遗址发掘坑位全景图

卫聚贤外,暨南大学教授张凤等人也参加了发掘。在张家库高冢山焦尾巴洞发掘六朝墓葬时,因为墓在半山上,向上翻土不易,卫聚贤等于是在墓前开了一条孔道,以便向下出土。无意间在孔道中发现了一处圆形地穴,并且出土了许多质地较粗的砖红色陶片。卫聚贤当时已怀疑这是新石器时代遗物,但当时长江以南的考古工作尚未正式展开,共同发掘的张凤等人以“长江下游尚无石器遗址发见”为由,多不相信。后来发掘出一件完整的磨光石斧,卫聚贤才将遗址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。发掘结束后,因为张凤等人仍然怀疑遗址的年代为“准新石器时代”,认为“江南在新石器时代无人,石器是后人用的药铲”,卫聚贤又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对石器进行鉴定,李四光和张凤持同样的意见,认为“江南不应有石器”。卫聚贤并未灰心,他又电请他的老师——当时已经是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来南京鉴别。1930年因为河南地方势力的干扰,安阳的发掘工作正好处于停顿状态,李济就在这年的5月份来到南京。他认为“证据太少,不足以证明”,希望卫聚贤继续有新发现<sup>⑩</sup>。卫聚贤等人于是又费了许多功夫,在甘夏镇西岗头上和土地庙找到性质形同的两处遗址,发掘出小半

个圆形地穴,十几件石器和许多粗陶片<sup>⑪</sup>。栖霞山墓葬发掘后不久,卫聚贤因发掘获得赞誉而遭人嫉妒,于是借被派往山西调查为名,解除了职务。因为离职,栖霞山的发掘卫聚贤没有来得及编写报告,他只在1930年《东方》上做过简介<sup>⑫</sup>,而已经编好并交付商务印书馆排印的《明故宫发掘的报告》,则在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当中,毁于日军飞机的轰炸<sup>⑬</sup>。

1930年被派往山西后,10月30日~11月8日,卫聚贤和董光忠、张蔚然(两人此前都曾在史语所考古组任职)以山西公立图书馆的名义,在山西万泉发掘了汉汾阴后土祠遗址<sup>⑭</sup>,获得五铢钱、陶器、瓦当等

遗物<sup>⑧</sup>。卫聚贤的故乡万泉县古代属汾阴县,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时,卫聚贤就在家乡发现了与西阴村出土陶片相似的石器时代遗址,而且曾因汾阴后土祠的地望专门写过文章,认为并不在很多书记载的荣河县,而是在万泉县柏林庙附近<sup>⑨</sup>。因为卫聚贤曾在柏林庙东南二里的延子圪塔发现过“长乐未央”的瓦当,他认为汾阴后土祠就在这里。这也是促成他1930年发掘后土祠遗址的主要原因(图一~图五)。后土祠试掘完后,卫聚贤等在周围调查时又发现了瓦渣斜遗址,并进行了小规模试掘。后土祠出土的部分遗物运回北平后,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想在山西发掘,又恐怕山西方面不允许他们把古物带出省,于是聘请卫聚贤为女师大研究所的研究员,实际上是作为担保人,同山西省国立图书馆合作发掘。卫聚贤于是又代表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,和代表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的董光忠一起,联合山西国立图书馆,于1931年4月1日~5月15日在万泉县的荆村瓦渣斜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,发现了窖穴、灶址等遗迹和比较丰富的各种石、骨、陶器等遗物<sup>⑩</sup>。值得注意的是,瓦渣斜试掘因为有曾在史语所考古组参加过殷墟发掘的董光忠、张蔚然两人参加,展示出较高的田野水平<sup>⑪</sup>。发掘者不仅准确发掘出单个和相互打破的袋状灰坑,而且清楚认识到,“如此交错之二窑或多窑,在古代当不能同时挖窟以住居”<sup>⑫</sup>。

1931年荆村遗址发掘的遗物运到北平后,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和卫聚贤解约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欲聘请卫聚贤授课,但恰巧上海发生了“一·二八”事变(1932年),卫聚贤不得不返回山西,在国民师范学校短期任教。5月5日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签署后,卫聚贤暑假后又返回上海,先后在暨南大学教授《历史研究法》<sup>⑬</sup>,后又在持志学院教授考古学课程<sup>⑭</sup>,还曾在中国公学任教。1933年5月,他担任“中国考古会”属下的调查委员会委员<sup>⑮</sup>。同年12月,卫聚贤出版了《中国考古小史》一书。这是中国第一本考古学史著作,完成于1931年<sup>⑯</sup>。李济为这本书作序,和卫聚贤一同发掘栖霞山的暨南大学教授张凤写了校语,胡肇春为书作跋。胡肇春后来最早翻译了瑞典学者Montelius(蒙德留斯)关于类型学的经典著作《考古学研究法》<sup>⑰</sup>,同时,还译有英国著名考古学家Woolley(吴理)和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的考古著作<sup>⑱</sup>。《中国考古小史》篇幅不大,仅一百多页,主要按时代介绍了各地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,条理清晰,确实如李济在序中所说那样,“使读者一阅而知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事实,是很值得我们感谢的”。此外,如卫

聚贤主持的明故宫、甘夏镇等发掘,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写出正式报告,这本书因为是亲历者撰写,多少也保留了一些上述遗址的考古资料。

此后,卫聚贤经友人介绍,又在国民党监察院、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任职。由此,卫聚贤从史学界进入了金融界,但是他对考古的热情仍然不减。1935年5月,常州名士江上梧等人在江苏常州淹城游玩时发现了土坯古城遗址,并采集到多种几何纹陶片。他们立即邀请张凤、蒋大沂等人前来访古。时隔数日后,卫聚贤在16号也来到常州,同蒋大沂、金祖同等人一同参加了调查<sup>⑲</sup>。这一年的8月份,张凤等人又到金山卫的戚家墩遗址进行调查,见到不少陶片,经与卫聚贤研究,他们初步定为汉代以前的遗物。9月初、10月初,卫聚贤又两次前往遗址进行考古调查,采集到许多陶片<sup>⑳</sup>。同年,金山、淹城两地的调查分别出版了专著<sup>㉑</sup>。1936年2月15日、16日两天,卫聚贤等人在上海文庙路民教馆举行了金山、淹城古物展览会,陈列了古陶片千余件及少量石器<sup>㉒</sup>。1936年2月,吴稚晖、卫聚贤等人在上海商讨筹建吴越史地研究会。吴越史地研究会尚处在筹备期间时,就在5月31日和西湖博物馆合作,发掘了浙江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,并马上出版了《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》<sup>㉓</sup>。同年8月30日,吴越史地研究会在上海正式成立,蔡元培担任会长,于右任、董作宾等人理事,而卫聚贤则担任研究会的总干事。吴越史地研究会1937年出版了《吴越文化论丛》一书,书中收录了24篇有关吴越古史、考古方面的文章,而卫聚贤的文章就占了其中8篇之多。该书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古荡、良渚出土石器的年代。早在1930年发掘南京栖霞山时,卫聚贤就认为发掘所得石器属新石器时代,但遭到张凤、李四光等人的否定,李济也因为资料过少而不置可否。杭州古荡、良渚发掘出石器后,卫聚贤认为这些石器属新石器时代,江南文化由此也拉长了数千年。卫氏此说一出,便遭到了包括参加古荡发掘的西湖博物馆主任胡行之等人的反对<sup>㉔</sup>。胡行之、刘之远等人认为,历史文献上记载的浙江古文化,只能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吴越,而西湖在远古可能是海滨。古荡出土的石器精美光润,特别是中间还有钻孔,只有铁器或铜器才能穿磨而成,因此这些石器只能是金石并用时期的遗物,时代也只能推定到周末为止。卫聚贤对胡行之等人的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,坚持认为石器的年代应属新石器时代<sup>㉕</sup>。

吴越史地会成立不久,卫聚贤完成了第二部考



古学史著作——《中国考古学史》<sup>③</sup>。撰写这部著作的原因,是因为《考古学小史》略古而详今,并且出版后的5年内中国考古学突飞猛进,增加了不少新材料。《中国考古学史》的篇幅较《中国考古小史》一书增加了近两倍,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:第一,《中国考古学史》增加了很大篇幅写中国古代考古学。书中对近代真正意义上考古学史的叙述仅10页,对周~清代的所谓“考古”学史的记录,却有121页之多。第二,在保留《小史》关于古物保管法附录的同时,另增了一个长达146页的附录——“各地发现古物志”,专门用于报道自1932~1936年散见于各地报纸上的考古消息。这份附录实际上既弥补了正文中对真正意义上考古叙述的简略,也弥补了正式报告短期不能出版的缺点,让读者对各地的考古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。书中引用的报刊今天很多已经不易见到,因此卫聚贤这本书的附录,不仅为了解当时的考古学发展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,使用起来也很方便。因此,《中国考古学史》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上,的确应该占有一席之地。

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,中日战争正式开始。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,卫聚贤留在被沦陷区包围的“孤岛”——上海租界里,继续在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。在此期间,西湖博物馆施昕更编著的《良渚》报告,在几经周折后,由董聿茂馆长派人到上海印刷。施昕更请卫聚贤帮助校对,卫聚贤在校对完之后,1938年9月1日为报告写了“校后记”,肯定了施昕更在学术上的贡献<sup>④</sup>。在上海租界期间,卫聚贤利用闲暇时间编辑了一部字源,因为无钱印刷,于是从1938年1月起,卫聚贤以私人名义编印《说文月刊》。起初的目的是为了把字源分期发表,但是当时上海的学术刊物都已停办,文化界的人士纷纷向《说文月刊》投稿,因此刊登文章的题材范围广泛,包括文学、语言、历史、考古、古钱、文艺及经济问题等。汉奸以为卫聚贤在替政府联络文化人,遂寄给卫聚贤手枪子弹以示恐吓,卫聚贤因此向中央银行申请调往内地<sup>⑤</sup>。内调获得批准后,卫聚贤化妆后乘船绕香港、越南到达云南,之后又到重庆,担任上海中央银行秘书处书记<sup>⑥</sup>,同时继续主编《说文月刊》。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,日军侵入上海租界,《说文月刊》因此停刊半年。1942年7月起,《说文月刊》在重庆重新复刊。

《说文月刊》刊登过郭沫若、董作宾、姜亮夫、吕思勉、于右任等诸多名家的文章,其中包括很多考古的文章。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。第一类是近似

考古调查性质的文章,如林名均的《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》、《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发掘》、陆懋德的《沔县新石器时代遗址探访记》、金静庵的《沙坪坝发现古墓纪事》、陈志良的《香港访古纪》、D.J.Finn,S.J.的《香港船辽洲史前遗物发现记》、R.Maglioni的《海丰史前遗物发现记》、何士骥的《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》等。第二类是考古研究方面的文章,如陶大镛的《中国金石并用时代的生产技术》、《中国石器时代的生产技术》、卫聚贤的《中国东南沿海发现史前文化遗址的探讨》、《吴越考古汇志》、《巴蜀文化》、常任侠的《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》、《重庆附近发见之汉代崖墓与石阙研究》等。第三类是和金石学关系更密切的文章,如孔德成的《簠簋觶觚说》、郭宝钧的《薛氏款识齐侯钟铭读法考》、黄希成的《新津出土蜀王虎钟考略》、卫聚贤《函皇父诸器考释》等。卫聚贤在《说文月刊》上发表了大量文章,范围颇为广泛,包括古史、考古、民俗、钱币等等。

在重庆期间,卫聚贤和郭沫若等人还进行过一次考古发掘。1940年4月7日,卫聚贤和郭沫若在嘉陵江北岸调查时发现了几块汉砖和一对石椁。次日,两人又约同马衡、常任侠等人继续调查,在周围又发现了数座汉墓。14号,连同新增加的胡小石教授,几人一同发掘这些墓葬。卫聚贤负责发掘的汉墓出土了大批五铢钱、一把铁剑和数件陶器<sup>⑦</sup>。21日试掘结束后,卫聚贤等人还在当地半山竹庐内举办了一天的小型展览,展示各种文物图案的汉砖十几种,参观人数达到两千以上,22号重庆多家报纸均报道了这次展览会的情况<sup>⑧</sup>。郭沫若还专门为这次发掘出土的汉砖题诗五首,其中“宝剑已残琴已烂”、“髀上尤余汉代钱”等诗句,都是描写这次考古发掘的场景<sup>⑨</sup>。这是郭沫若在大陆参加过的唯一一次考古发掘<sup>⑩</sup>,也是卫聚贤生平参加的最后一次考古发掘。

20世纪40年代初,卫聚贤在成都购买了一批相传出土于白马寺附近的铜器,因为这批铜器和中原出土的铜器风格迥然,卫聚贤在《说文月刊》上发表《巴蜀文化》一文,首次提出了“巴蜀文化”的概念。“巴蜀文化”的概念当时遭到了多数学者的反对,直到60年代以后才得到正式承认,并且一直沿用至今,广为人知<sup>⑪</sup>。1943年2月,卫聚贤与李济、傅斯年等发起成立“中国史学会”。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,卫聚贤继续留在重庆,在此期间,他出版了几部关于中国帮会的著作<sup>⑫</sup>。1949年12月重庆解放,卫聚贤将收藏多年、准备用来成立通俗博物馆的1万八千余件文物捐给西北军委会,他还一度来到北京文

物局述职<sup>④</sup>。但是因为种种原因,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陆。

1951年1月卫聚贤由重庆到达香港<sup>⑤</sup>,这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。从此,他在海外漂泊了近四十年,为了生计各处教书,在没有考古条件、大陆又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,考古逐渐淡出了他的视野。卫聚贤抵港后先在珠海书院授课,继而在光夏书院授课,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。1960年起他又在联合书院、华夏、联大、远东等书院教课。在香港教书的二十多年里,卫聚贤仍然高产,出版了大量著述,涉及领域广泛。但他用力最多、影响最大的,还是在中美(洲)交通史的研究上,他力主美洲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<sup>⑥</sup>。为此他写过大量相关的文章,1969年他还在香港出版了《中国人发现美洲》一书(约三百万字),1975年在台湾又出版了《中国人发现美洲初考——文字与花纹》等著作<sup>⑦</sup>。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,卫聚贤在1954年乘坐根据汉代船只复原的木舟,经南洋东驶美洲,做了一次近乎实验考古学的冒险。木舟最终在距离岸边百里处失事,卫聚贤遇船相救才得以脱险<sup>⑧</sup>。虽然这次冒险以失败告终,但是一位55岁的老人有此壮举,着实难能可贵。与学术丰产形成对比的,却是现实生活的困顿和残酷。因为历年任教的多是私立院校,薪水微薄,加之又常常要自费印书,虽然有时同时在两所学校任职,卫聚贤的生活依旧艰苦。他一度竟然因为无法维持生活,要向香港福利机构申请救济,并且在很长时间内,依靠出售稀有藏书维持生计。因为在香港生活艰辛,卫聚贤1975年携家眷离港赴台湾定居。临走前他曾哀叹道:生活对于老年知识份子来说,是太残酷了,教书职业已不再是光荣的职业<sup>⑨</sup>。

卫聚贤到台湾后在新竹定居,任辅仁大学教授。虽然年已古稀,但他依然笔耕不辍,相继出版了十几本著作,内容涉及考古、历史、谱牒学各个方面。此外,他仍然不能忘情于野外调查,曾经亲自到新竹蝙蝠洞考察出土古物,又赴五峰乡深山考证矮人祭,到各大山为台湾“山胞”寻根。1989年11月16日,卫聚贤在台湾因病逝世,终年90岁。

卫聚贤的一生,可以称得上是“传奇”。他一生涉足历史、考古、银行界,著述极多,涉猎广泛,并且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,连张光直都曾说,他一生最钦佩的读书最多的人,就是这位大师兄<sup>⑩</sup>。但同时,这位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学者,常常因为一些怪论而遭人非议。例如,中国南方考古近乎一片空白时,卫聚贤便提出江南有新石器时代遗址。安阳发掘不久,

卫聚贤一反文献关于商人来自北方(陕西、山东或东北三省)的记载,提出是商人自浙江迁往河南的新说,并且认为商人的始祖是黑人。他后来研究中西交通史,根据文献记载认为,在哥伦布之前已经有百余个中国人到达过美洲,其中孔子到美洲看见向日葵和红木,张衡到过美洲图书馆看书,李白到美洲吸过烟草,杨贵妃马嵬坡未死,被人送到美洲去了<sup>⑪</sup>。今天看来,卫聚贤当时被认为是怪论的,如江南有新石器遗址,早已被证明是真知灼见,但平心而论,也有一些观点,确实给人以穿凿附会之感。卫聚贤在学术史上评价不高,或很少被人提及,和这一点是有关的。例如在考古界,1949年前的大陆考古界是以李济等学院派学者为主的,而李济最讲的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,绝不轻易推论,他的学生夏鼐等都继承了这种传统。因此,虽然卫聚贤承认李济是他的老师,李济却因为治学方法不同而不承认他是门生弟子<sup>⑫</sup>。相对于同时代学院派考古学家,卫聚贤没有经过严格的考古训练,也没有真正在考古圈里工作过,在他们眼里,卫聚贤可能只算得上是个考古的“票友”,因而不免会对其有所忽视<sup>⑬</sup>。卫聚贤自己也说过,别人说“考古学家卫聚贤有名无实”,到处说我做学问是“胡说八道”<sup>⑭</sup>。而1949年之后,长期的高压政治下,连李济都长期背负着“反动学者”的骂名,直到80年代之后才慢慢恢复名誉,卫聚贤这位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工作,又与孔祥熙等人多有牵连,注定要被有人有意遗忘<sup>⑮</sup>。而考古又是一门无情的学科,大量新资料的涌现,不断更新着人们的认识,很多研究结论不久就会成为明日黄花。等到大陆政治气候好转时,已经距卫聚贤那些论述写作的时间有近半个世纪之久了,考古学上的材料早已日新月异,因此卫聚贤也很少被人提及。至今人们知道他的名字,恐怕还要有赖于他那本再版多次的《中国考古学史》。

但是卫聚贤作为一名业余的考古学家,有他自己的贡献。他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不久于南京、杭州进行的考古发掘,开了南方考古之先河。在学术研究上,他撰写的考古学史著作,有学术史上首创之功。他最早主张江南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观点,早已被考古学所证实,他提出的“巴蜀文化”等概念,也一直沿用至今。此外,值得赞赏的,是他一直积极宣扬考古。他不仅在多次发掘后举办展览<sup>⑯</sup>,向民众介绍考古知识,而且还出点子在江浙各县遍设“吴越史地研究会”分会,把考古所得的样本分送各县,向民众普及知识的同时,也方便他们报告新的发现,以便及时调查<sup>⑰</sup>。李济曾在文章中讲过,他的一名朋友在中学

当历史教员,当时河南的石器时代遗址才公布,他在课堂上摒弃三皇五帝,只讲石器时代、铜器时代文化,结果全体学生都以为他在讲笑话。时隔十年,情形全变了,好些乡下小孩也都知道“石器时代”这个名词了<sup>⑤</sup>。考古知识在民众之间能这么快的普及,除了学院派学者的努力之外,卫聚贤这些热心的考古“票友”的宣传介绍,也是功不可没的。

卫聚贤生于贫苦之家,但是却能够始终自强不息,特别是晚年在香港,虽然长期处于困顿之中,却能够矢志不渝地钻研学术,的确让人敬佩。走笔至此,笔者仿佛又听到了卫聚贤那句饱含心酸的感慨:生活对于老年知识份子来说,是太残酷了。2009年,是卫聚贤先生逝世20周年,也是他诞辰110周年。虽然豁达的哲人曾说过,“人生一世,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”<sup>⑥</sup>,但在凡人眼中,世间最无情的还是遗忘。笔者愿以此小文,怀念这位长期默默无闻的中国考古学界的先驱者。

本文得到陈星灿先生的悉心指导,在此深表谢意。

附录:卫聚贤在大陆期间发表的考古论著一览表

《中国考古学小史》(1933年)

书评 克凡《华年》第3卷第12期(1934年)

同上 驹井和爱《人类学杂志》第49卷第52期第201页(1934年)

《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经过和见解》《东方杂志》第26卷第4期

《南京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》《东方》第27卷第1期(1930年)

《吴越民族》《进展学刊》第1卷第2、3期合刊(1935);后收入《吴越文化论丛》一书(1937年)

《江苏古文化时期之重新估定》《正风》(1936年)

“杭州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序”

“古荡为制造石器工厂之推测”

“古荡出土之新石器与吴越文化”

“江苏古文化时期之重新估定”

以上收入“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探试报告”(1936年)

书评:松本广信《人类学杂志》第51卷第12期(1936年);此文后收入《吴越文化论丛》一书(1937年)

同上:三上次男《考古学杂志》第27卷第7期第493-499页

《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与西北的检讨》《东方杂志》第34卷第7期(1937年)

《吴越文化传播于黄河流域的说明》《东方杂志》第34卷第10期(1937)

《吴越史地与现代文化和民族关系的重要性》《嘉区民国日报》(1937年6月19日)

《江南出土古物的经过及感想》(上海)《时事新报》(1937年6月23日)

《中国古文化由东南传播于黄河流域》《吴越文化论丛》(1937年)

《浙江石器年代的讨论》《吴越文化论丛》(1937年)

《吴越考古汇志》《说文月刊》第1卷第3期(1938年)

《中国东南沿海发现史前文化遗址之检讨》《说文月刊》第1卷第8期

《巴蜀文化》《说文月刊》第3卷第7期

(据安志敏《中国史前考古学书目》、《说文月刊》、《吴越文化论丛》等书摘抄而成)

注释:

西方学者、日本学者当然也做了很多考古工作,但本文主要是讲中国学者的贡献。

如以下几篇文章:a.陶喻之:《上海首次田野考古的前前后后》,《东南文化》1996年第3期;b.王启龙、屈殿奎:《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》,《山西地方志》,1992年第1期(总第91期);c.傅振伦:《怀念卫大法师》,《沧桑》1993年第1期;d.散木:《一位传奇的史学家卫聚贤》,《文史月刊》2004年2月;e.散木:《话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卫聚贤》,《文史杂志》2004年第3期;f.《民国人物小传——卫聚贤》,《传记文学》,二零零七年十月号第九十一卷第四期;g.吴汝祚:《施昕更与何天行》,《东南文化》1997年第1期;h.王心喜:《“小人物”发现“大文化”——良渚文化发现者施昕更评传》,《华夏考古》2006年第1期。此外,一些以前较少提及的学院派考古学家现在也有人专门写过文章,如林锦源:《吴金鼎在中国史前考古上的贡献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2003年第3期。此外,为行文简洁,对卫聚贤先生及文中涉及的各位学者,均省略“先生”等尊称。

、、 卫聚贤:《鲁智深传》,《说文月刊》第一卷第八期。

李光谟:《从清华园到史语所——李济治学生涯琐记》第96~98页,清华大学出版社,2004年。

卫聚贤:《中国考古小史》,第58页,商务印书馆发行,1933年。

卫聚贤:《中国考古小史》,第82~83页,商务



印书馆发行,1933年。

a.卫聚贤:《鲁智深传》,《说文月刊》第一卷第八期;b.卫聚贤:《浙江石器年代的讨论》,收入吴越史地研究会编:《吴越文化论丛》,江苏研究社,1937年。此书1990年5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“中外文化要籍影印丛书”之一重新印刷(影印)。

李光谟撰:《李济先生学行纪略》,收入张光直主编:《李济文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6年。

⑪ 关于这甘夏镇新石器遗址发掘这段经历,卫聚贤在两处不同的地方,对其时间、出土遗物数量的叙述并不一致。根据卫聚贤《中国考古学小史》,在甘夏镇共发掘了三处遗址,而且时间都是三月份,而根据《李济文集》第449页,卷五的“李济先生学行纪略”,李济是5月份才到南京的。可见卫氏在李济到南京后并没有进行新的发掘。而根据卫聚贤《吴越民族》(载《进展月刊》发表(1931年)、《浙江石器年代的讨论》(载《吴越文化论丛》,1937年)、《吴越考古汇志》(载《说文月刊》第一卷第七期)三篇文章,卫聚贤是先发掘了六朝墓前那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,电请李济来南京判别了石器的性质后,因为李济认为“无证太少,不足以证明”(见卫聚贤:《鲁智深传》,《说文月刊》第一卷第八期),于是卫聚贤又开始寻找,“共找到三处,得石器七八件”,按此说法,后来的发掘是在五月份以后了。《吴越民族》一文是在卫聚贤发掘栖霞山遗址当年写就的,卫氏当时的记忆应较为可信,因此笔者以为,后一种说法似较为可靠。此外,陶喻之在《上海首次田野考古的前前后后》一文中说,卫聚贤抱着“浙江文化本亦甚古”的念头,经过数年努力,在杭州杭嘉湖一带调查发现了古荡、良渚、钱山漾遗址,这也不确切。钱山漾遗址是时任上海沪江大学秘书的慎微之发现的(慎微之:《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》,见《吴越文化研究论丛》第217~232页),良渚文化是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发现的(施昕更:《良渚》,浙江省教育厅,1938年6月;施昕更:《杭州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》,《吴越文化论丛》第195~216页)。

⑫ 卫聚贤:《中国考古小史》,第55~57页、第78~79页,商务印书馆发行,1933年。

⑬ 卫聚贤:《南京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》,《东方》27/1(1930年)。笔者没能找到这份刊物,是从安志敏先生著的《中国史前考古学书目》中获知的。

⑭ 见卫聚贤:《中国考古小史》李(济)序后卫聚贤的附白,商务印书馆发行,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。

⑮ 卫聚贤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发掘的,他自己在

文章中的说法不太一致。按《中国考古小史》上的记载,他当时就是代表北平女子师大发掘的。而《鲁智深传》中,卫聚贤说是先发掘了后土祠遗址,将一部分古物带回北平后,师大研究院想在山西发掘,但又恐怕山西方面不让把古物运出山西,所以才聘卫聚贤为研究院的研究员的。本文下文依《鲁智深传》。

⑯ 董光忠:《山西万泉县阎子疙瘩汉汾阴后土祠遗址之发掘》,1932年。

⑰ 卫聚贤:《汉汾阴后土祠遗址的发现》,《东方杂志》第二十六卷第十九号。

⑱、⑳ 董光忠:《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经过》,《师大月刊》第3期(1933年)

㉑ 董光忠参加了安阳殷墟第2次(1929年春,小屯)、第3次(1929年秋,小屯)发掘,张蔚然参加了小屯第3次(1929年秋,小屯)发掘,之后两人均未再参加过安阳发掘。张蔚然于安阳第2、第3次发掘期间,测绘过小屯第一张地形图(见李济:《安阳》第71页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0年)。此外,张蔚然还写过《殷墟地层研究》一文(《安阳发掘报告》第二期,1930年),将安阳发现的夯土解释为洪水沉积层,很有影响。直到1930年李济等在城子崖发现夯土墙,才明白这是夯土。

㉒ 卫聚贤:《我的“胡说”》,《传记文学》第二十八卷第二期(1976年)。

㉓ 什么时候在持志学院任课,卫聚贤在不同的地方说法不一。按《鲁智深传》,卫聚贤是1934年离开暨南大学后在持志学院等地教书的。而根据卫聚贤《中国考古小史》的附白,他最迟在1932年10月就已经在持志学院任教了。

㉔、㉕ 《民国人物小传——卫聚贤》,《传记文学》二零零七年十月号第九十一卷第四期。

㉖ 卫聚贤:《中国考古小史》第57~60页,商务印书馆发行,1933年12月。

㉗ (瑞典)孟德鲁斯著,郑师许、胡肇椿译:《考古学研究法》,1936年12月。此外,滕固也翻译过这本书,见蒙德留斯著、滕固译:《先史考古学方法论》,商务印书馆,1937年1月。滕固的译本似乎更有影响。

㉘ (英)吴理著、胡肇椿译:《考古学发掘法》,商务印书馆,1935年8月;(日)滨田耕作著、胡肇椿译:《古玉概论》,中华书局,1936年11月。胡肇春曾在1936年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,Montelius和滨田耕作的书,都是作为上海市博物馆丛书出版的。

㉙ 陶喻之:《上海首次田野考古的前前后后》,

《东南文化》1996年第3期。

②⑧ 《申报》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三日。转引自卫聚贤:《中国考古学史》第240页,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,1937年2月出版,1983年第5版(台湾)。

②⑨ a. 陈志良:《奄城访古记》,秀州学会,1935年;b. 金祖同:《金山卫访古记纲要》,秀州学会,1935年。

③⑩ 《时事新报》1936年3月4日。转引自卫聚贤:《中国考古学史》第255~257页,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,1937年12月出版,1983年5月第5版(台湾)。

③⑪ 卫聚贤等著:《古荡新石器遗址试掘报告》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、吴越史地研究会,1936年。

③⑫ 胡行之:《浙江果有新石器时代文化乎》;刘之远:《石器的形成与地层之探讨》,两篇文章均收入吴越史地研究会编:《吴越文化论丛》,江苏研究社,1937年。

③⑬ 卫聚贤:《浙江石器年代的讨论》,收入吴越史地研究会编:《吴越文化论丛》,江苏研究社,1937年。

③⑭ 卫聚贤:《中国考古学史》,第136页,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,1937年12月出版,1983年5月第5版(台湾)。

③⑮ 施昕更:《良渚》,浙江省教育厅,1938年6月。

③⑯ 卫聚贤:《鲁智深传索隐》,《说文月刊》第一卷第八期。

③⑰ 关于卫聚贤怎样从上海到重庆的,有不同说法。此处笔者是依据卫聚贤《我的“胡说”》一文。2007年《传记文学》上《民国人物小传——卫聚贤》一文说,卫聚贤从上海辗转前往大后方时,曾担任过陕西西安西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。而且该文特别说明,清华大学出版社《清华人文学科年谱》第38页所说的卫聚贤曾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说法是错误的。王启龙等的《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》一文,也说卫聚贤曾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,不过改为了1941年。笔者查阅了《西北大学史稿》(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,西北大学出版社,1987年9月第1版),西北大学的前身——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(1937年10月——1939年8月)当时尚无文学院,只有“文理学院”,院长是刘拓,国文系主任是黎锦熙,历史系主任是许寿裳。而1939年9月——1946年6月城固时期的国立西北大学,文学院院长先后由刘拓、马师儒等人担任,并未见到卫聚贤的名字。因此

笔者以为,卫聚贤从上海到重庆,当时属于上海中央银行的内调,根据他的《鲁智深传索引》,应该很快就来到了重庆,似乎没有在西北大学或西南联大任教的可能。另外据散木《一位传奇的史学家卫聚贤》一文,卫聚贤在重庆期间曾兼任过西南美专的教授。

③⑱ 郭沫若:《今夕蒲剑》,新文艺出版社,1955年2月上海新1版。

③⑲ 曾凡模:《郭沫若〈题富贵砖拓墨诗〉时间地点的补正》,《社会科学集刊》1988年3期。

④⑩ 《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(上)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1982年8月第1版。原书把这五首诗编在1943年,有误。

④⑪ 夏鼐:《郭沫若同志和田野考古学》,《考古》1982年第5期。据夏先生说,郭沫若在日本还参加过一次考古发掘。

④⑫ 何志国:《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》,《四川文物》1997年第4期。

④⑬ 如《中国的帮会》;《江湖话》;《红帮汉留人物故事》;《袍哥入门》等。

④⑭ a. 傅振伦:《怀念卫大法师》,《沧桑》1993年1期;b. 傅振伦:《蒲梢沧桑——九十忆往》,第147~148页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7年。

④⑮ 关于卫聚贤是怎样到香港的,说法不一。散木在《一位传奇的史学家卫聚贤》一文中说,卫聚贤是1950年先到台湾,之后又到香港的。而《传记文学》的《民国人物小传——卫聚贤》,则说他是直接由重庆到香港的。笔者以为,考虑到1950年前后的台海形式,从大陆直接到台湾恐非易事,《传记文学》的说法似更为可靠。此外,《四川文物》上《四川境内出土或传世罽于述略》上说,有一件环钮罽于是卫聚贤1951年11月捐赠的,时间也不对。

④⑯ 转引自郭少棠等:《香港的史学研究》,《史学理论研究》1998年第3期。

④⑰ 转引自柯可:《台湾的美国史研究》,《世界史研究动态》1982年第4期。

④⑱ 傅振伦:《怀念卫大法师》,《沧桑》1993年1期。

④⑲ 以前对于卫聚贤在香港和台湾的情况,缺乏资料。幸而2007年台湾《传记文学》中《民国人物小传——卫聚贤》一文,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他在香港、台湾的宝贵资料。本文关于卫聚贤在港、台的经历,多是参考此文写成的,以下恕不一一详注。

⑤⑩ 见张光直为陈星灿:《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》一书作的序,三联书店,1997年。



⑤① 转引自《世界史研究动态》1982年第4期。

⑤② 夏鼐:《郭沫若同志和田野考古学》,《考古》1982年第5期。

⑤③ 这是笔者的感觉。如李济,除了为《中国考古小史》作序外,在生平300余万字的著述中再也没提过卫聚贤。夏鼐也是如此,仅有的提及卫聚贤的《郭沫若同志和田野考古学》一文中,对卫聚贤也暗含讽刺。此外,石璋如在长达30多万字的口述史《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》中,提及了很多同时代许多学人,但一次也没提及卫聚贤。阎文儒在《中国考古学史》中写过山西汾阴后土祠和荆村的发掘,但是只提董光忠的名字,也没有提及卫聚贤。

⑤④ 卫聚贤和孔祥熙是山西同乡。据傅振伦介绍,卫聚贤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任职期间,得到兼任

行政院长、财政部部长、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的信任与倚重。此外,孔祥熙还在卫聚贤主办的《说文月刊》发表过文章(孔祥熙:《西北文化》,《说文月刊》第三卷第十期)。

⑤⑤ 卫聚贤:《吴越考古汇志》,《说文月刊》第一卷第三期。

⑤⑥ 散木:《一位传奇的史学家卫聚贤》,《文史月刊》2004年第2期。

⑤⑦ 李济:《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》,收入李济著:《考古琐谈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,1998年。

⑤⑧ 何兆武口述,文靖撰写:《上学记》,三联书店,2006年。

(责任编辑:刘慧中)

(上接第155页)

洪州窑始烧自东汉晚期,历六朝隋唐,至晚唐五代渐至衰落,凡八百余年。对洪州窑兴起的历史背景、生产传统以及其走向衰颓的内外动因,广大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了关注。

余家栋通过对2002年赣江北岸东汉龙窑以及与青瓷产品发掘情况的介绍,揭示了洪州窑早期的瓷业生产面貌,初步澄清了南方印纹硬陶、原始青瓷与成熟青釉瓷器间的关系。认为洪州窑成熟青瓷是楚越文化交融的产物,其在南方制瓷传统上博采众长,延烧创新,自成体系,提出江西地区是中国青瓷最早的发源地之一。

王光尧通过系统梳理从商周时期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发展历程,探讨了洪州窑兴起的历史机遇与传承体系,认为江西地区青瓷的兴起与原始青瓷体系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,而是汉代以降楚越文化结合的产物。

针对晚唐五代洪州窑生产渐至衰颓的原因,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视角探寻答案。秦大树认为晚唐五

代时期洪州窑生产成本的逐渐提高,从而导致其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。欧阳世彬则认为晚唐已降,洪州窑的窑具渐趋粗化,直接导致其装烧工艺停滞不前;同时当地的地势局限陶土原料无法完成精细的淘洗,这种原料上的局限使洪州窑产品失去了进一步精化和上升的空间,渐渐滞后于时代主流,最终为历史所淘汰。

5. 洪州窑遗址的保护与利用。与会学者就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洪州窑遗址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延续性,怎样合理利用文化遗产、促进地方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。徐怡涛作为洪州窑遗址保护与利用规划的主要策划人,就遗址保护、管理、展示和利用现状、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做了客观评估,同时按照不同级别,阐述了相应的划分原则和保护措施,分两个阶段预置了今后的考古规划以及相应的居民动迁、企业整治等社会调控方面的规划部署。

(责任编辑:刘慧中)